



《南园漫录》成书过程及版本流传考述

陈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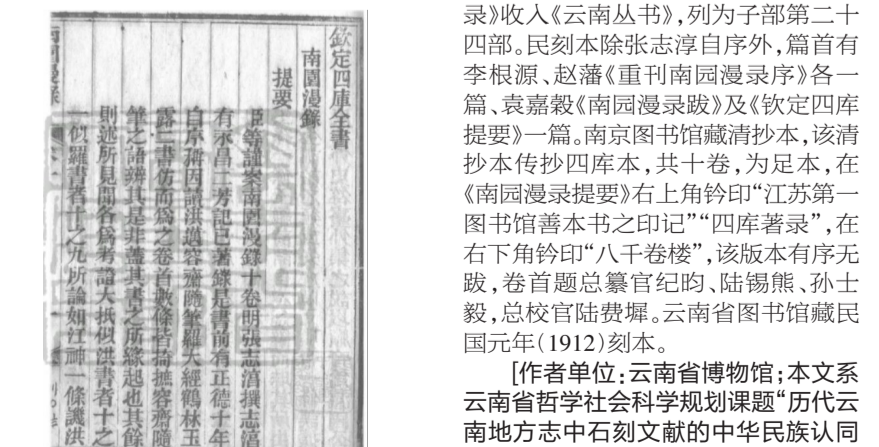
张志淳(1458—1538年),字进之,号南园,晚年又号南园老翁。明云南永昌(今保山)人,先祖原籍应天府(今南京)江宁县。张志淳成化年间进士,初授北京吏部文选司主事,历官员外郎、郎中、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南京户部右侍郎等。张志淳一生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历经明代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五个时期,是明代中期重要的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及学者,是明代云南最为著名的学者。

多部史籍对张志淳的生平与成就多有记载。《大明一统志》载:“本朝张志淳,其先江宁人,洪武中迁金谿司。淳登成化甲辰进士,由吏部文选司主事起家,仕至南京户部右侍郎,学行两全,名实并懋,卒赠祭乡贤祠。”《四库全书本《滇略》卷六载:张志淳“天性聪哲,六艺咸通;功业夙著,为时崇尚。”(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天启刻本,卷一百四十四载:张志淳“晚年著书自娱,天性聪哲,六艺咸精。嘉靖间,进阶议大夫,十六年,诏有司问劳,年八十一而卒。所著有《南园集》《西铭通》《南园漫录》《永昌二芳记》,记行于世,长子含,举人,以诗名。次子含,壬辰进士,仕至参政。”张志淳晚年所著主要诗文集,惜皆失传,唯有《南园漫录》十卷传世。《南园漫录》是张志淳流传下来的最具体表性的作品,也是明代云南学人唯一人选《四库全书》的著作。

成书过程及背景。《南园漫录》成书于嘉靖五年(1526年),是张志淳致仕后在云南保山地区写成,是汇集作者见闻、读书心得的笔记杂录。《南园漫录》的成书过程有其特定的背景:明代文治大兴,治学风气良好,学者辈出,学派林立,著述繁荣,尤其自正德以来,笔记体文章进入了繁荣期,作品数量激增,整个社会呈现出稽古右文的风气。《南园漫录》正是在此时期问世。同时,当时保山地区大量学校建立、民间读书考试之风兴起,儒学思想发展迅速,学术氛围浓厚,这些皆对张志淳的文化学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园漫录》撰写亦与张志淳的亲身经历密切相关。正德九年冬,张志淳生了一场大病,“凡书之宏深旁魄者,皆不能事事,则取杂说如《容斋随笔》者数十家以消”,儿子张含问“何不效为一书乎”。张志淳在正德十年所写自序中有:“因读宋洪迈《容斋随笔》、罗大经《鹤林玉露》,有所感发,仿而为之。”之所以“有感而发”,是因为他在读《容斋随笔》时,发现其中内容多有抵牾,遂产生纠偏正误的念头。

主要内容和著述体例。《南园漫录》全书共十卷184篇,卷首有序,卷末有跋。《南园漫录》是笔记体,其本身具有博杂的特点,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哲学、艺术、边事以及风土人情各个方面,涉及永昌的历史和物产风俗,记录明代学术思想、评价历史人物和时贤及其著作、记录时事、历史事实考证、语言释义和音韵专用术语等。《南园漫录》主要以“随笔形式,分条评议时事,疏证经史,纠偏正误,臧否人物,或言经过,或发其隐微”,是云南学人具有代表性的笔记,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笔记体格式和撰述。张志淳在编写《南园漫录》时给每一篇拟定了题目,在编纂方面也体现出对前人的笔记体有所创新,在明代笔记史上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

特色。内容上,题材丰富,主题多样,补缺订误、考据翔实。《南园漫录》内容较杂,引用文献内容丰富且涉及朝代较广,所辑录的材料广泛,翔实多样,在选取资料上做到慎取史料且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既有主观的议论评价,也有客观的表述;既有对史实的考证梳理,也有对有价值材料的记载留存;既有对具体词语的解释,也有对整体情况的概括说明。写作原则上,坚持“据实而为”



图为《南园漫录》卷首提要 作者供图

抗战烽火中的云南文化堡垒

袁开友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七·七事变”为起点,对中国发动由东北向华北、华东、华南推进的,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被迫西迁,东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下湖南,又西迁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址设于昆明。在这一时期,昆明逐渐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面对严峻的抗日形势,爱国学生积极成立社团、创立报刊宣传救国思想,为抗战胜利奉献自己的力量。

群社的成立

1938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联合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随之而来的是一批具有爱国精神的师生队伍,因为他们大多是“五四运动”以及“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身上有着强烈的革命传统,这群爱国师生来云南后,积极投身抗日战争。西南联大的三十余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重新建立了抗日民族先锋队,和云南的青年抗日先锋队联合成立了云南民族解放先锋队。由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主要成员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1938年,西南联大的爱国学生成立了群社,大多数“民先”队员加入群社,并成为其中的骨干。群社积极发展成员,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并迅速发展成为西南联大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群社下设学术、时事、文艺、壁报等分支,给予学生极大的自主性,群社由学生领导,其选举以及负责人的产生、社团开展的各项内部活动都是自行组织。群社

一共经历了六届,展开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多次邀请联大教授讲述国际反法西斯形势,邀请记者讲述抗战的情况,每逢日军轰炸,都积极参与到救助伤员的活动中。群社展现出的爱国精神,感染着联大师生,受到师生们的广泛欢迎。

群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互相交往,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为宗旨,在丰富广大学生生活的同时,积极地通过报纸、文艺活动等方式宣传抗日。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群社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抗日救国积蓄了磅礴的力量。

抗日报刊的发行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抗日报刊和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鼓舞全国人民士气的重要工具。而云南的共产党员与爱国学生的联合,在抗日救亡刊物的发行中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响应党的号召,发展社大党组织的力量,中共云南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于11月恢复重建,并号召昆明的各个学校声援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得到了广泛响应,5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7年8月,中共云南临工委组织成立了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创立了抗日救亡刊物《云南学生》,与此同时,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还创立了《群声》《冬青》《热风》等壁报宣传救国思想,受到了师生们的广泛欢迎。除了通过

报纸进行宣传,西南联大学生们还走出校门进行抗日宣传,他们定期到中小学进行宣讲,在假期到贡县、龙头村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抗日救国。随着华中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沿海城市的一些学校相继西迁,也带来了一大批爱国师生和优秀学者,一时间云南人才云集,为爱国团体和救国报刊的创立提供了支持。共产党人抓住时机,联合爱国师生创立了大量的报刊,如《南方》《前哨》《战时知识》《民众歌咏》《曙光日报》等众多刊物都是在共产党人的支持或者领导下创立的,这一系列抗日救亡刊物的发行,对唤醒民众的爱国意识,激发民众自信心以及社大云南的民主力量起了积极的作用。

文艺作品的传播

除了报纸的宣传以外,文艺作品的传播也是宣传救国思想,唤醒民众爱国意识的重要方式。1937年9月18日,云南学生抗敌后援会在昆明师范学校开展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的活动,并游行示威,社会各界参与者3万余人,师生和人民群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等歌曲,歌声响彻校园和昆明街头。共产党人赵国徽、李家鼎等人大力宣传抗战歌曲,成立民众歌咏团,吸纳学生与爱国民众。歌咏团成立后,众多学生踊跃参与,并在校内成立了歌咏队,从校园到大街小巷,处处响起了爱国救国的声音。同时,戏剧社也不断涌现,如西南联大话剧团,成员包括闻一多、吴晗等知名学者,话剧团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结合抗战背景改编剧本,常在昆明街头、学校、工厂等地演

出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也有学生自发组织成立联大新剧社,著名的金马剧社也是在这一时期在云南本地的戏剧工作者和进步青年的支持下成立的,其剧目《血洒卢沟桥》《钦差大臣》在当时备受欢迎,戏剧团在昆明不断进行巡回演出,传播爱国思想,为激发民族爱国意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然而,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战,于1941年制造了“皖南事变”,在统治区内推行白色恐怖统治,以昆明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受其影响,逐渐陷入低潮。直至1943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开始局部反攻,并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早已失去民心,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云南的抗日民主力量受到了鼓舞,重新迸发出生机与活力,其主要形式仍然以社团为中心,通过壁报和文艺作品发展民主运动进行抗日宣传。1944年,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学校相继恢复活动,通过《冬青》《文艺》《学习》《游击》《现实》等壁报批判社会现实。

以学生为中心的各类社团与进步报刊、文艺作品的创立和传播,构成了一道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唤醒国民爱国意识的文化堡垒,充分彰显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担当。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更应该不忘历史、居安思危、砥砺前行!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

爱国侨领马铸材:以商为“媒”书写赤子情怀

夏玉清 吴沁阳

在中华民族14年全民族抗战的壮阔史诗中,海外侨胞始终是支撑国内抗战的重要力量之一。他们虽身处异国他乡,却以赤子之心为祖国奔走,用捐款捐物、筹运物资、凝聚侨力等多种方式,构筑起了跨越国界的国际抗日支援网络。在这一群体中,动员和组织边疆抗战的侨领马铸材(1891—1963)是全民族抗战的典范。马铸材原名荣坤·次仁桑珠,是来自云南省中甸的藏族商人,因侨居印度噶伦堡创建“铸记”商号而闻名。抗日战争时期,他以“商”为媒搭建抗战军需运输通道,凝聚多民族侨胞力量,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抗战的典型代表。

搭建战时军需运输通道

马铸材的商业决策始终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七·七事变”后,他深刻意识到“商人”之责,不仅在谋生计,更在救国家,随即启动全面战略调整:一是暂停民用商品的采购与销售,将大部分的仓储空间、马帮队伍划归到军需运输专用。二是主动对接中国驻印度使馆与“西南运输处”,承接其相关运输任务。三是优化运输网络,从印度把物资运至中国境内后又从西藏、云南经茶马古道进行转运,将大批量的货物用最原始的手段从噶伦堡运到丽江,支援前线抗战。1939年至1945年期间,马铸材常年奔波于噶伦堡—

加尔各答—昆明—丽江的运输线路上,其主导的“铸记”商号成为了茶马古道上最为活跃的军需运输力量之一。据统计,仅在抗战期间,云南与印度年贸易额就稳定在20万—60万卢比。从运输物资的种类与规模看,“铸记”商号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以吡叽布为主的军需布料运输。吡叽布因质地厚实、耐磨,是战时军装的核心原料,“铸记”商号通过印度纺织厂的采购渠道,累计向国内运输印度产的吡叽布近万吨,有效缓解了前线抗战部队“冬无棉衣、夏无单衫”的困境。其二,民生与医疗物资转运。除军需外,“铸记”还承担生丝、棉花等轻工原材料,以及战时急需药品的转运工作,为滇西、缅甸战场防治疟疾提供了关键保障。其三,参与美国援华物资转运。美国援助中国的毛毯、军靴、蚊帐等物资,部分经印度噶伦堡中转,“铸记”商号承接了该项任务,虽因1945年抗战胜利导致部分运输终止,但仍体现了其为国效力的态度。

募集海外财力支援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费开支急剧攀升,长期战争导致的农业减产、工业破坏,使国内财政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作为印度噶伦堡侨界的核心人物,马铸材深知“侨胞财力虽微,凝聚起来便是抗敌洪流”的道理,他主动扛起组织募捐的重任,联络印度各地侨团和

各地汉藏侨民,在印度侨界构建起名为“抗日月捐”的活动,并按月将所得款项汇至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由领事馆转送国内。此举打破了印度侨胞“地域分散、互不联络”的局限,使“支援抗战”成为侨界共识。

除常态化月捐外,马铸材还针对前线的“急需物资”发起了专项捐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集资购买战斗机”行动。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空军战损损失惨重,为保障前线抗战顺利,马铸材指示“铸记”丽江分号联合当地知名商号——恒盛公、永昌祥、协树昌、元德和,共同集资25万法币,购买了一架美国的战斗机捐赠给了国家,成为了印度侨界的标志性贡献。这些多元化的支援行动,既弥补了“月捐”数额有限的不足,也展现了马铸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战担当。

团结侨群凝聚抗战共识

战前华侨社会组织分散,印度的侨胞缺乏统一的侨团组织,地域观念浓厚,长期初期难以形成支援合力。全面抗战后,大量来自云南、西藏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与缅甸华侨涌入噶伦堡,子女就学成为侨胞最迫切的需求。马铸材意识到,办学不仅是解决教育问题,更是传承中华文化、凝聚爱国共识的契机,随即联合噶伦堡侨领张相诚、梁子质,向中国驻英属印度总领

事馆提交报告并请求指导。中华学校的课程设置注重“文化与爱国并重”,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学校面向所有的侨胞子女开放,且不分民族、籍贯、宗教,各民族学生同校就读,打破了民族之间的隔阂。

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旨在保卫滇缅公路与支援英军。同年5月,因战局失利,远征军一支撤入英属印度,于8月在兰姆伽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开启整训备战。这一事件为马铸材团结侨群、推动中印民间协作提供了重要契机。1942年10月,马铸材派长子与侨领梁子质代表噶伦堡侨胞赴兰姆伽训练营慰问中国远征军。1943年1月,中国远征军将领洞洞(军长)、廖耀湘(师长)访问噶伦堡,马铸材积极组织噶伦堡的汉藏侨胞、中华学校师生共同欢迎,为后续中印民间物资互助奠定了基础。此次互动,为中国的驻印军队提供了稳定的海外后方支持。

马铸材的抗战实践,虽局限于印度侨界,但其价值远超地域与时代的界限。铭记马铸材等海外侨胞的抗战贡献,传承其爱国主义精神,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注入不竭动力。

[作者1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作者2系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南洋华侨工科学读本》的研究成果]